

浙东文化研究

(第2辑)

East Zhejiang Cultural Studies

◎ 张 伟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东文化研究

East Zhejiang Cultural Studies

(第2辑)

◎ 张 伟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东文化研究. 第2辑 / 张伟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308-15542-7

I. ①浙…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浙江省—文集
IV. ①K29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0518 号

浙东文化研究(第2辑)

张 伟 主 编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596 千

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542-7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com>

前 言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推动浙东文献与藏书文化研究,2014年11月15—16日,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浙东文化与宁波文化大市建设研究中心、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089)研究团队在宁波联合举办了“浙东文献与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东吴大学、江南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海洋学院、浙江科技学院、绍兴文理学院以及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方志办、浙江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南宋史研究中心、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6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本辑即为研讨会论文的汇编。

浙东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素有文献之邦、藏书之乡之称。加强浙东文献与藏书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度挖掘浙东文化资源、推动浙东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传承浙东优秀传统文化、助推浙江文化强省建设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本辑共选录论文49篇,研究范围涉及文献与藏书研究的方方面面。希冀本辑的问世,能够对浙东文化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编 者

2015年7月

目 录

日藏浙东文献管窥·····	袁 颖	刘恒武(001)
日藏汉籍与浙江文献整理·····	李广志	(009)
贺琛《溢法》考辨·····	吴从祥	(016)
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	何卯平	(023)
浙东文献所见当地妈祖信仰的两面性·····	潘承玉	(032)
论刘安节及其所编《伊川语录》 ——兼论两宋之际《二程语录》的整理与流传·····	申绪璐	(044)
略论吕东莱在文献学上的贡献·····	徐儒宗	(052)
叶适《进卷》的学术价值·····	闵泽平	(062)
“甬上四先生”的《诗经》文献及其思想特质释论·····	范立舟	(072)
南宋《孟子》的目录学分类 ——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个案·····	王 宇	(081)
吴梦窗词集版本流变及评述·····	孙 虹	(087)
《嘉定赤城志·秩官门》校考补正·····	周祝伟	(098)
论《古今纪要逸编》的撰写背景和史料价值·····	何忠礼	(106)
黄潜与宋元浙东地区儒学评鉴及谱系初构 ——以《文献集》浙东士人墓志为中心·····	程继红	(114)
元人题鄞县周氏耕隐斋诗文辑考·····	张如安	(135)
日用类书与《多能鄙事》·····	马金霞	(147)
浙中王门学者叶良佩及其存世文献考论·····	张宏敏	(156)
张元忭著作考·····	钱 明	(167)
《黄南山全集》的架构及其思想价值·····	邹建锋	(176)
《广志绎》海洋史料价值述论·····	王万盈	(183)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成书考·····	童 杰	(192)
十六世纪末的东亚局势 ——以海外孤本《抚浙奏疏》为中心·····	郑洁西	(198)
邵廷采与《思复堂文集》·····	邢舒绪	(206)
《分隶偶存》与清初隶书复兴·····	刘晓峰	(217)

全祖望《鮑埼亭集》对黄宗羲学行论衡之辨析·····	张天杰(224)
全祖望对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创作及贡献·····	乐承耀(237)
近现代学者所撰“章学诚遗著研究”述评(1920—1940)·····	黄兆强(246)
《白湖竹枝词》三十首笺疏·····	王孙荣(254)
毛奇龄与《湘湖水利志》·····	宫云维(266)
清考据学家洪颐煊著述存佚考·····	胡正武(273)
晚清黄式三、黄以周未刊稿六种考录·····	张 涅(284)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十翼后录》七卷本叙录·····	韩伟表(292)
薛福成与《浙东筹防录》·····	张 杰(298)
李拙子与《拙言》·····	倪浓水(304)
拼凑、虚构与自相矛盾:《鄞塘楼氏宗谱》考辨·····	唐燮军(310)
一部未能完成的民国慈溪县志·····	童银舫(319)
历代浙江通志考述·····	沈松平(324)
彭独盒及其《甬上杂著》研究·····	钱茂伟(339)
浙东的“另类”文献	
——堕民文献的整理与抢救·····	谢一彪(350)
试论《浙鸿爪印》的语料价值·····	许建平(362)
文献材料利用与方言词汇研究	
——以宁波方言为例·····	周志锋(374)
宋元时期宁波私家藏书探微·····	冯晓霞(379)
台州藏书家与台州学术传统·····	何善蒙(388)
黄宗羲藏书思想浅析·····	贾庆军(395)
学人藏家徐时栋	
——《徐时栋年谱》前言·····	龚烈沸(400)
五桂楼的兴衰历程及修复对策·····	华建新(405)
天一阁与五桂楼藏书制度之比较·····	诸焕灿(414)
天一阁藏四种浙东清人文集稿本提要·····	周慧惠(420)
天一阁旧藏之流泽余芳	
——《鄮峰真隐漫录》校点后记·····	俞信芳(427)



日藏浙东文献管窥

袁 颖 刘恒武

(宁波大学)

摘 要:日本现存的浙东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齐全,其中还包含了数目可观的古旧善本。本文介绍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国立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研究机构和图书设施所藏浙东文献的状况,同时指出,虽然近年来日本中国学研究走入低谷,但由于浙东地处东亚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浙东文献容纳了大量反映古典东亚历史走向的宝贵信息,故而日藏浙东文献仍将受到日本及国际学界的持久关注。

关键词:浙东文献 日本中国学 文化交流

日本汉学传统可以上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遣唐使时代,奈良、平安朝廷派往唐朝的遣唐使开启了大量携回中国典籍的先河。从平安、镰仓、室町直至江户时代,历代日本知识界持续不断输入、收藏、整理中国典籍,使得日藏汉籍的数量逐渐积累得十分庞大。^①浙东宁波是古代中国与日本交往的门户,浙东地区也因之成为前明治时期日本最为关注、最为熟悉的汉土一隅。目前,日本的浙东文献收藏量在海外首屈一指,因此,了解日藏浙东文献对于从事浙东历史文化的研究者而言是相当必要的。本文拟就日本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收藏浙东文献的概况、日本学界浙东文献的研究现状以及日本浙东文献的流通交易状况做一介绍,希望借此引起学人对日藏浙东文献的关注。

一、日本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所藏浙东文献

日本一流国立大学文献资料设施和知名公私立图书机构是集藏中国图书和汉籍

^① 关于汉籍输往日本的历史以及日藏汉籍的整体状况,严绍璦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介绍最详。



的“富矿区”。就日本高等院校收藏中国典籍的状况而言,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东北大学、大阪大学和九州大学等顶尖国立大学,由于自建校起一直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故所藏汉籍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公、私立院校。不过,需要一提的是,日本私立院校的汉籍富藏程度,未必与学校的整体声望成正比。例如,京都佛教财团创设的净土三校——龙谷大学、佛教大学和大谷大学,均有十分深厚的中国学传统,中国学科研团队几十年来都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准,故而其汉籍保有数量超过一般的私立院校。相比之下,日本关西地区综合排名位居前列的同志社大学、关西学院大学等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大学在中国文献的收藏上并无优势。

日本收藏浙东文献最多的学术和藏书机构包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国立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以下依次对它们收藏浙东文献的状况进行介绍。

1.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是日本最顶尖的两所汉学研究机构,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依托的京都大学则是日本中国学渊薮,百余年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等京都学派优秀学者们的论著深深影响了世人对古典中国的认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建于1929年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于1938年改称东方文化研究所,此阶段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并不隶属于京都大学。1939年,京都大学始设人文科学研究所。1946年,东方文化研究所与旧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合并为新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京都大学的下设研究机构。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京大人文研)所藏汉籍主要来自几位中日藏书名家——陶湘、松本文三郎、中江丑吉、村本英秀和内藤湖南,其中,京大人文研购置的天津著名藏书家陶湘所藏明清丛书多达数百种2.6万多册。京大人文研的汉籍,大多收藏在位于京都北白川的分馆书库中,其所藏浙东文献以地志类最为丰富,版本比较古旧的州府志有清人曹秉仁修雍正《宁波府志》(乾隆六年补刊本),清人徐时栋辑《宋元四明六志》(烟屿楼刊光绪五年校印本)及《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9卷,烟屿楼刊光绪五年校印本),清钱维乔、钱大昕等修《鄞县志》(30卷,乾隆五十三年刊本、衙署藏版),清周炳麟修《余姚县志》(27卷,光绪二十五年刊本),清钱开震修《奉化县志》(志14卷、图1卷、补遗1卷、志余1卷,光绪十一年刊本),等等;寺观志有明闻性道撰《天童寺志》(10卷,道光三十年刊本)^①、清戴明琼纂《明州岳林寺志》(6卷,咸丰七年据康熙二十六年重刊本);地方水利志有清周道遵撰《甬上水利志》(6卷,道光二十八年序活字印本)。

人文研还藏有大量的历代浙东学人著述,如:宋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97卷,乾隆三十二年新安汪氏刊本)、《慈溪黄氏日抄分类》(97卷)附《古今纪要》(20卷)

^① 天一阁也藏有道光三十年刊《天童寺志》,1980年,上海古籍书店将天一阁藏道光三十年刊《天童寺志》与民国九年的《天童寺续志》影印后合订出版。



(慈溪冯氏耕余楼刊本),宋楼钥《攻媿集》(112卷,附清傅以礼辑《拾遗》1卷,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重编校刊本),明钱肃乐《四明先生遗集》(清代姚莹、顾沅辑《乾坤正气集》所收,光绪元年补刊本),清董沛《甬上宋元诗略》(16卷,光绪七年刊),清全祖望《鮑埼亭集》(38卷、外编50卷,附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10卷、年谱1卷,同治十一年杭州万氏刊本)、《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嘉庆九年刊本)、《年华录》(4卷,嘉庆二十年日新堂刊本),清万斯同撰《群书疑辨》(12卷,嘉庆二十一年甬上水氏供石亭刊本),清胡泉《王阳明先生经说弟子记》(4卷,咸丰八年刊本),等等。

京大人文研收藏中国方志文献之富,在日本研究机构中位居前列。京大人文研所藏浙东方志中有大量清代线装本,虽无稀见珍本,但足以满足研究者文献查阅的需求。相比于方志类文献,京大人文研所藏浙东历代先贤文集数量相对较少。另外,笔者在赴京大人文研进行文献调查之际,还看到清薛福成《浙东筹防录》(4卷,光绪十三年无锡薛氏刊本)、清佚名《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一卷》(罗振玉辑《玉简斋丛书》所收,宣统二年据手稿本刊)等书。

2.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东文研)成立于1941年,最初专门为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而设,后来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亚洲。东文研早期所收汉籍主要来自大木贯一、长泽规矩也、仁井田升等人。1948年,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并入东文研,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旧藏尽归合并后的东文研,其中包括东方文化学院于1929年购得的中国藏书家徐则恂“东海藏书楼”4万余册藏书。目前,东文研所藏汉籍古籍1万余种。

东文研所藏浙东地区方志典籍中,有不少清代刊刻的地方志,其中包括孙诏等修《慈溪县志》(16卷,乾隆三年补刊本),许琰撰《重修南海普陀山志》(20卷,乾隆五年序刊)、张恕等纂修《鄞县志》(75卷,光绪三年刊本)、于万川等修《镇海县志》(40卷,光绪五年刊本)、王瑞成等修纂《光绪宁海县志》(24卷,光绪二十二年刊本)、李前泮等纂修《奉化县志》(40卷,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历代浙东士人的著作和文集,东文研几乎都有收藏,其中不乏明清刊本,如宋黄震著《慈溪黄氏日抄分类》(97卷,乾隆三十二年新安汪氏刊本);宋史浩撰《鄮峰真隐漫录》(50卷,光绪二十六年史廷霖绿野艸堂活字印本),宋王应麟撰《小学紺珠》(10卷,明刊本)、《诗地理考》(6卷,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通鉴地理通释》(14卷,明正德中补刊本),清黄宗羲撰《宋元学案》(100卷,光绪五年龙汝霖等长沙重刊本)、《明儒学案》(62卷,乾隆四年序刊本),清全祖望撰《年华录》(4卷,嘉庆二十年日新堂刊本),清阮元辑《天一阁书目》(4卷,嘉庆十三年宁绍台道陈廷杰刊本)。

3.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是日本的国家图书馆,前身是东京书籍馆,始设于1873年,1897年改称帝国图书馆,1949年改为今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最初的藏书,是明治废藩置县之际从各地藩校征收而来的,之后通过历年接受捐赠和出资购置扩大书籍藏量,但其汉籍总量和善本数量均比不上另一家政府图书



馆——内阁文库。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一些明清刊刻的浙东方志,诸如:明张时彻纂《宁波府志》卷十二(江户写本)、明张时彻纂《宁波府志》(42卷,嘉靖三十九年序刊本)、明沈应文等纂《新修余姚县志》(24卷、图1卷,万历三十一年序刊本)、明周应宾撰《普陀山志》(6卷,万历三十五年序刊)、明释密云撰《天童寺志》(10卷,崇祯五年序刊本)、明郭子章撰《明州阿育王山志》(明万历四十七年序刊本)、清钱维乔和钱大昕等修《鄞县志》(30卷,乾隆五十三年刊本),等等。

另外,该馆古本汉籍中还有少量涉及地方财赋、物产的文献,如《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赋役全书——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刊)、《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赋役全书——道光九年》(清写本)、清陈寿彭撰《宁波物产表》(1卷,上海农学会《农学丛书》第1集第19册所收,光绪石印本)。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浙东先贤著述中,以宋王应麟的《玉海》(204卷,元刊本)最为珍贵。此外,一些汉和旧刊,如明张时彻撰《急救良方》(2卷,江户写本)、明屠隆撰《新楔屠先生编选依韵萃壁故事》(5卷,万历三十七年刊)、明屠隆撰《由拳集》(30卷,世锦堂藏板明刊本)、清沈复生辑《浙东三烈集》(清铅印本)、清宋恕的《浙东宋氏六斋卑议》(1卷,光绪二十三年铅印本)等,也值得关注。

日本各大图书机构均着意搜求中国碑拓,而且藏品数量和种类之丰富,保存与整理之精谨,往往超越我国同级别的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古旧碑拓中,《上海四明公所其他碑拓本》与宁波有关,值得从事宁波帮研究的学者前去展阅。

4. 内阁文库

内阁文库隶属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其所藏汉籍主要由红叶山文库、昌平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谈所以及江户医学馆等江户幕府图书和教育机构的旧藏组成。红叶山文库原本是德川家康所设书库,早期收纳了不少丰臣氏在侵朝战争中搜掠的朝鲜及中国古籍。德川氏主政之后,红叶山文库开始发挥国家图书馆的功能,陆续接收了日本各地诸藩进献的汉籍善本,汉籍藏量逐渐丰富。红叶山文库接收的诸藩进献汉籍中,九州大分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所献旧藏精品数量最巨。昌平黉旧藏是江户硕学林罗山及林氏子孙的私家藏书,随着18世纪末林家塾转变为幕府官学,林家私藏典籍也转为幕府官用图书。

内阁文库所藏古本浙东方志有:明张时彻纂《宁波府志》(42卷,嘉靖三十九年序刊本)、明张时彻等纂《定海县志》(13卷,明嘉靖四十二年序刊本)、明周应宾撰《普陀山志》(6卷,万历三十五年序刊)、清华大琰等纂修《宁海县志》(12卷,康熙十七年刊本)、清李郁等编《象山县志》(16卷,康熙二十二年序刊本)、清张起贵等编《奉化县志》(14卷,康熙二十二年序刊本)、清王梦弼等修《镇海县志》(8卷,乾隆十七年序刊本,附周樽编乾隆四十五年序刊本《同善院志》),等等。

内阁文库所藏古本历代浙东文人著述甚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宋楼钥纂《攻媿集》(112卷,清刊武英殿活字本)、宋王应麟纂《三字经》(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宋释重显纂《庆元府雪窦明觉大师祖英集》(2卷,日本镰仓时代东福寺刊覆宋本)、明



王守仁纂《传习录》(6卷, 明刊本)、明宋仪望纂《阳明先生文粹》(11卷, 隆庆六年刊本)、明张时彻纂《善行录》(8卷, 明嘉靖三十二年序刊)、张时彻纂《芝园别集》(奏议5卷、公移5卷, 明刊本)、张时彻纂《摄生众妙方》(11卷, 明嘉靖四十一年江西布政司刊本)、明屠隆纂《娑罗园清语》(明万历二十七年序刊本)、屠隆撰《昙花记》(4卷30折, 明刊本)、明万表纂《万氏家抄济世良方》(7卷, 万历四十六年刊本)、清黄宗羲纂《南雷文定》(前集11卷、后集4卷、附1卷, 康熙二十七年序刊本)、全祖望撰《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10卷, 清刊本)、清胡文学纂《甬上耆旧诗》(30卷, 康熙十五年序敬义堂刊本), 等等。

5. 东洋文库

对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而言, 东洋文库既是日本最大的中国文献典籍宝库, 也是中国学研究的重镇。东洋文库的本底典籍资源来自英国人莫里逊创建的莫里逊文库, 莫里逊文库集藏了莫里逊担任北洋军阀政府顾问20年间(1897—1917)搜罗的图书文献, 这些文献主要是有关东亚以及东南亚的西文著作, 还有大量可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各国官方报告和文书。莫里逊文库的文献资料最早藏于北京东交民巷, 1917年, 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久弥以35000英镑的价格将莫里逊文库整体买下并运回日本。1924年, 岩崎久弥再斥巨资建立东洋文库, 以莫里逊文库为基础, 陆续购入亚洲各国典籍, 遂成当今规模。

东洋文库所藏浙东地志类典籍相当宏富, 其中不乏旧版明清志书, 例如: 明释无尽撰《天台山方外志》(30卷, 明万历四十年刊本)、明郭子章撰《明州阿育王山志》(明万历四十七年序刊本)、清唐若瀛等纂修《余姚志》(40卷, 乾隆四十六年刊本)、清史鸣皋等修纂《象山县志》(12卷, 清乾隆二十四年刊本)、清周圣化等修《定海县志》(8卷, 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清张铤等纂修《鄞县志》(32卷, 咸丰六年刊本)、清王梦弼等修《镇海县志》(8卷, 乾隆十七年序刊本)、清王鼎勋等编《重修南海普陀山志》(20卷, 道光十二年序刊本)、清董沛撰《明州系年录》(7卷, 光绪四年刊本)。

东洋文库所藏历代浙东文人撰写和编纂的古籍包括: 宋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古今纪要》(19卷, 明刊本)、元戴表元《剡源先生文钞》(4卷, 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本)、明屠隆等《伐水编》(4卷, 明万历三十九年序刊本)、清黄宗羲《宋元学案》(100卷, 附《宋元学案考略》1卷, 光绪五年龙汝霖等长沙重刊本)、清全祖望《鲒埼亭诗集》(10卷, 光绪十六年大鄞山馆重刊本)、清万斯同《石经考》(1卷, 常熟蒋氏省吾堂刊本)、清朱宗元撰《拯世略说》(1卷, 清同治十二年上海慈母堂重刊本), 等等。

6. 静嘉堂文库

静嘉堂文库的创建人是三菱财团的岩崎弥之助, 他于1892年开始收集中日古籍, 1907年购得清末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全部藏书, 使静嘉堂一跃成为日本闻名的私立图书机构。皕宋楼所收主要是宋元珍稀刻本, 十万卷楼则专藏明以后的秘刻、精抄本和精校本, 守先阁藏书虽以一般书籍为主, 但也大多是古旧刻本, 陆氏旧藏成为静嘉堂藏书中最珍贵的组成部分。1924年, 静嘉堂在现址设馆, 并对外开放。1926—1936年, 近代日本著名的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主持



图书编目搜购工作,这10年间,静嘉堂文库所藏汉籍继续增加,目前文库汉籍总量已达12万册之多。

静嘉堂文库所收浙东历代学人著述,主要是韶宋楼和十万卷楼的旧藏,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宋王应麟撰《玉海》(204卷,韶宋楼旧藏元刊本)、王应麟撰《诗考》(6卷,韶宋楼旧藏元刊本)、宋黄震著《慈溪黄氏日抄分类》(97卷,韶宋楼旧藏元刊本)、元袁桷《清容居士集》(50卷,韶宋楼旧藏元刊本)。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旧刻本还包括:宋楼钥撰《攻媿集》(112卷,十万卷楼旧藏清刊武英殿本)、宋史浩纂《鄮峰真隐漫录》(50卷,十万卷楼旧藏清刊本)、宋王应麟撰《困学纪闻》(20卷,明刊本)、宋黄震著《慈溪黄氏日抄分类》(97卷,附《古今纪要》19卷,竹添井井旧藏正德十四年刊本)、元戴表元著《剡源戴先生文集》(30卷,十万卷楼旧藏明刊本)、明王守仁撰《王文成公全书》(38卷,十万卷楼旧藏明隆庆刊本)、王守仁撰《阳明要书》(8卷、附5卷,崇祯五年刊本)、明范钦撰《天一阁丛书十八种》(明刊本)、明屠隆撰《由拳集》(30卷,守先阁旧藏明万历刊本)、清黄宗羲撰《明儒学案》(62卷,乾隆刊本)、清全祖望撰《句余土音》(3卷,附《甬上族望表》2卷,嘉庆十九年刊本)、全祖望撰《鮑埼亭外编》(50卷,十万卷楼旧藏嘉庆十六年刊本)、清胡文学编《甬上耆旧诗》(30卷,守先阁旧藏清刊本)、清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书目》(4卷,光绪刊本)、清阮元和范懋柱编《范氏天一阁藏书总目》(10卷,十万卷楼旧藏嘉庆十三年刊),等等。

静嘉堂文库所藏方志古籍主要是陆心源守先阁的旧藏,其中包括:清方传綫等编《道光象山县志》(22卷、附象山文类2卷,守先阁旧藏道光刊本)、清曹膏等编《乾隆奉化县志》(14卷,守先阁旧藏乾隆刊本)、清冯鸿模等编《雍正慈溪县志》(16卷,守先阁旧藏雍正刊本)、清王梦弼等修《镇海县志》(8卷,守先阁旧藏乾隆刊本)。

除上述2家研究所、4家图书机构之外,日本其他很多公立和私立的图书馆也收藏有不少古刻本浙东文献和珍贵的碑铭拓本,例如: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宋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元刊本(20卷)、苏轼书《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宋拓本、道潜书《景德寺转轮藏记》宋拓本、范成大书《赠佛照禅师诗碑》宋拓本^①;前田育德会尊经阁藏有明嘉靖版的张时彻《宁波府志》(39卷)、明万历版的屠隆编《国朝七名公尺牍》(8卷);蓬左文库藏有日本室町时期覆宋刊本释普济撰《大川语录》(含《庆元府大慈名山教忠报国禅寺语录》等)、嘉靖三十六年胡宗宪重刊本明钱德洪等编《阳明先生文录》(5卷,附外集9卷);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日本正德六年刊刻的朱舜水著《舜水先生文集》(28卷)。

二、日本浙东文献整理与研究现状

近10年来,日本学界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首先,在中国学教

^① 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16页。



育方面,日本大学中国史和中国文学专业的在籍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锐减,很多院校的相关专业已经陷入或面临关、停、并、转的困境。另外,就中国学研究而言,目前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是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曾在中国留学或访学的优秀学人,他们不仅从老一辈日本中国学家身上继承了扎实的古汉文功底,而且能够自如地运用现代汉语与中国学界开展交流。近年来,这些学者陆续退出一线研究岗位,而其所属院校及研究机构却不再设置中国学研究职位,这极大地挫伤了青年研究者从事中国学研究的积极性,直接导致了现今日本中国学研究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窘境。

论及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地域文献的整理和地域史研究,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关涉日本自身历史、传统以及现实问题的研究工作更易获得各种支持。浙东宁波是历史上中日交流的枢纽,浙东地区自古以来就与日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无形的浙东学术和甬绍民俗,到有形的宁波佛画与梅园石雕,大量浙东文化元素跨海东渡、远播扶桑。因此,日本学界整理解读浙东文献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审视解析自身传统的欲望。在日本中国学整体趋于式微的近10年间,日本学界针对中国个别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在萎缩,不过,包括浙东在内的江南地域研究却依旧维持了相当的活跃度,这的确殊为难得。

2006—2010年由东京大学小岛毅负责的日本文部省重大人文研究项目“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以宁波为切入点,系统地考察了东亚海域交流对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过程的影响,项目组成员及参与学者达100多位,将日本学界对于宁波及其浙东腹地的文献史料、文物资料的关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小岛毅项目下设的子课题中,有若干课题将宁波及整个浙东的文献史料作为重要研究资源,如“从中国科举制度看宁波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宁波的知识活动及其传统——学术渊源、宗族、乡土爱”、“以宁波为中心的绘画和人的网络”、“11—16世纪东亚海域与宁波一博多关系”、“与朝鲜中、近世相关的东亚交流与宁波”、“宁波地区日明交流的综合研究——通过对遣明使的入明记的综合分析”、“宁波地域的水利开发与环境”、“杭州湾地区的城市、建筑、历史的结构”、“宋代浙江茶文化的研究——作为茶道文化的渊源”;另有几个课题则将浙东文献、文物的整理和解读作为课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记以及文集中所见宋元时代的东亚交流和两浙地区的社会经济”、“地方志以及碑记的史料学解析为主的近世东南沿海地区的地域性和历史性”、“中国东南部的学术与图书的收集、出版、流通”、“有关浙江、江苏地区的道教、民俗信仰的庙宇、祭神、礼仪的调查”。

“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项目已于2010年结题,该项目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与宁波及浙东地域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早坂俊广主编的《文化都市:宁波》^①、高津孝主编的《くらしがつなぐ寧波と日本》^②,前者从文献

① [日]早坂俊广:《文化都市:宁波》,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版。

② [日]高津孝:《くらしがつなぐ寧波と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版。



传承、郡邑士人、墓葬遗存等方面解析了宁波港城的文化基因,后者论述了宁波的都市环境、浙东的茶文化、戏曲文化、航海信仰以及宁波石刻文化东传等专题。另外还有东亚美术文化交流研究会的《寧波の美術と海域交流》^①、中岛乐章和伊藤幸司的《寧波と博多》^②,等等。除此之外,小岛毅项目组征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同意,影印复制了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所藏张寿镛的《四明经籍志》手书原稿,并将之公开刊行。

小岛毅项目历时4年,为日本学界的浙东文献研究注入了莫大活力。然而,从长期态势来看,日本中国学研究群体的缩小,势必影响到日本浙东文献研究工作的持续和研究水准的保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日本中国学的独立性日趋弱化,它与日本研究、韩国研究之间的交集将会受到重视,更多的研究者们把中国学看作理解整个东亚世界的一个途径,小岛项目本身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浙东宁波位于东亚海域世界的十字路口,浙东文献不仅是中国学领域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也是日本学、韩国学的研究宝藏。因此,随着学术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日本浙东文献研究仍将继续得到推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近年来日本中国学研究趋冷,大量中国史方面的著作和文献流入日本古旧图书市场,其中亦包含不少浙东文献的和、汉古刻本,例如:东京诚心堂书店出售黄宗羲撰《明儒学案》(32册,光绪十四年刊),售价为31.5万日元;大阪市中尾松泉堂书店出售万斯同《石经考》(享和二年刊和装本),售价3万日元;札幌市南阳堂书店售王阳明《传习录》(4册,明治四年和刻本),售价仅为7000日元。出于日本中国学研究者 and 爱好者人数锐减的原因,目前日本旧书市场上中国文献古籍的价格已经明显走低,相比于中国古旧刻本,和刻本浙东文献价格更为实惠。国内图书机构和研究者个人可以在细致调研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回购日本旧书市场上流通的旧刻浙东文献精品。

结 语

日本图书机构及人文社科研究单位保存的浙东文献,不仅藏量庞大,而且种类齐全,其中不乏珍稀的汉和古旧善本。京大人文研、东文研、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研究机构和图书设施中,浙东文献藏量最丰、善本和古本最多,值得国内研究者前往调研。近年来,日本中国学研究走入低谷,也给浙东文献研究带来消极影响,但由于浙东宁波是东亚海域交流的枢纽,浙东文献对于理解东亚世界整体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故而日藏浙东文献仍将受到日本及国际学界的持久关注。

① 东亚美术文化交流研究会:《寧波の美術と海域交流》,中国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日]中岛乐章、伊藤幸司:《寧波と博多》,汲古书院2013年版。



日藏汉籍与浙江文献整理

李广志

(宁波大学)

摘要: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中国典籍流向日本始终未曾间断。自隋唐以来,日本国内保存有大量的汉籍文献,其数量至今难以翔实统计。如何收集和整理日藏汉籍中的浙江文献,成为中日藏书文化的一个新课题。

关键词:日本汉籍 中国典籍 浙江文献 浙东文献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其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形式,即书籍交流。近年来,王勇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把书籍作为授受文化的主要载体,倡导中日之间有一条“书籍之路”^①。中国典籍犹如文明的种子,经由“书籍之路”传播到日本,在日本生根发芽,中华文明的基因在异域开花结果。汉字在公元前后便已传到日本,汉籍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见于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条,公元405年,百济国献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②。此后,汉字和书籍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日本不仅以此创造了文字,而且通过吸收和融合,使之成为自己的文化基因。同时,中日之间的书籍之路,并不是单一的输出,日本汉籍也有大量回流的现象。

庞大的日藏汉籍中,有关浙江方面的书籍为数不少。自唐以来,浙江沿海,尤其以宁波为中心,作为中日交流的重要门户,在书籍的输出与输入方面承载着千年历史。如何收集和整理在日本的浙江文献,成为中日藏书文化的一个新课题。

一、日本汉籍藏书概述

隋唐期间,日本相继派遣使臣来中国朝贡,同时伴随大批的留学生、留学僧来唐

^① 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5—12页。

^② [日]仓野宪司、武田祐吉:《古事记祝词》(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岩波书店1958年版,第248页。



学习先进文化。这期间,日本使节、中国赴日人员等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典籍带到日本,由此展开了书籍东传之路。唐代开始的雕版印刷,增加了书籍的数量,也为书籍传入日本打开了方便之门。到了8世纪中后期,雕版印刷术已经传到日本,日本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为百万塔《陀罗尼经》,此经大约印刷于日本天平宝字八年(764)至神护景云四年(770)间。^①但这个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尚未普及,多数典籍仍以手抄相传。

所谓日本汉籍,包含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日本所存的中国典籍。第二,日本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中国典籍在日本刊刻分“和刻本”与“翻刻本”两种,原书的白文再刻本属于翻刻本,复刻时添加训点、假名等的则为和刻本。和刻本中有些还冠以“改订”、“增补”、“影印”之名,一概称为“日本汉籍藏”^②。第三,经日本人加工,从而改变原本形态,具有日本汉文特色的中国典籍。第四,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著述,此类一般称为“日本汉文”。这类资料涉及面广,内容繁多,包括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旅游、风俗等各个领域,其中也不乏涵盖浙江方面的文献资料。

从唐代至清末,中国典籍源源不断地漂洋过海,其数量之大,难以完全掌握。仅唐一代,日本国内有记载的中国典籍就达1万多卷。据日本最早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70—891年编撰)显示,目录中共辑入书目1579部,计17345卷。该目录模仿《隋志》的形式编辑而成,合计四十家:易家、尚书家、诗家、礼家、乐家、春秋家、孝经家、论语家、异说家、小学家、正史家、古史家、杂史家、霸史家、起居注家、旧事家、职官家、仪注家、刑法家、杂传家、土地家、谱系家、薄录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楚辞家、别集家、总集家。

唐代小说家张鷟著的《游仙窟》在中国早已失传,然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录。是书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因而得以保存,清朝末年,此书又传回中国。仅此一例,便可窥见一斑。难怪1893年赴日考察的黄庆澄叹曰:“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土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③可见日本藏书之多,传书之贵。

日本汉籍藏书历来规范、有序。据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归纳^④,近代以来,日本汉籍藏书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场所:

(1)公立私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所藏汉籍数量多,版本齐全,主要包括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以及其他都道府县公立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

(2)大学图书馆。日本最早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创立于明治十年(1877)。

① 黄华珍:《日藏汉籍研究——以宋元版为中心》,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页。

② 王勇:《从“汉籍”到“域外汉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5—11页。

③ [清]黄庆澄:《东游日记》(5月26日)。参见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

④ [日]高田时雄:《近代日本之汉籍收藏与编目》,《2004年古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辅仁大学,2004年,第1—26页。



此后,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大学成立,另外一些私立大学也相继创办起来。这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图书馆里,汉籍藏书也数量可观。主要研究机构和汉籍集中的场所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北大学、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其他还有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等。

(3)寺社等宗教藏书。日本宗教设施主要包括佛教、神道教和近代兴起的基督教等,尤其是佛教寺院内藏有大量的佛经、汉典及其他古籍。自隋唐以来,日本僧人从没间断过搜求汉译佛典的进程。日本寺院林立,里面还藏有众多诗书礼赞、字画文墨等。

(4)私人藏书。中国典籍的传承与收藏,在私人手中的也为数不少。财力雄厚的三菱创办人岩崎之家,是搜集汉典的名家;安田财阀的安田善次郎也是汉籍名家,手中有许多古籍善本;日立铜山的创始人久原房之助家设久原文库,后成为大东急纪念文库的一部分;和田维四郎等人的岩崎文库,后捐献给东洋文库。

近年来,日本国内正在整合各种资源,创办汉籍资料文库,通过录入、影印等计算手段,逐步公开汉籍资料目录及全文。

二、汉籍的输出

7世纪初,中国典籍已大量传入日本。604年,圣德太子颁布《十七条宪法》,此时日本还没有创制出文字,原文都用汉语表述,其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如,一曰“以和为贵”,此句见《礼记·儒行》:“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另见《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此句见诸《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得闻佛名,法名及闻僧名,闻三宝名,即得往生。”诸如此类,每条均有出典。

《十七条宪法》中至少引经据典26种以上,主要包括:《周易》、《国语》、《管子》、《淮南子》、《礼记》、《论语》、《春秋左氏传》、《韩非子》、《孝经》、《说文解字》、《说苑》、《韩诗外传》、《老子》、《庄子》、《汉书》、《尚书》、《墨子》、《诗经》、《潜夫论》、《史记》、《孙子》、《楚辞》、《孟子》、《文选》以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等。可见,《宪法十七条》吸收了儒家、佛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派之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体系。

630年至894年,也就是日本派遣唐使时期,日本使臣大量携书回国,成为书籍东传的主要途径,《新唐书·日本》云:“悉赏物贸书以归。”如717年入朝的遣唐使,把朝廷赐予的钱物用于购置书籍,并带回国。804年,遣唐僧人最澄带回日本经书章疏230部460卷,另有《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及图像和法器等。^①806年,空海归国前在越州求书,至书越州节度使《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②欲求佛教的

①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② [日]空海著,渡边照宏、宫坂有胜校注:《三教指归·性灵集》,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272—277页。